

党的二十大精神·共同富裕研究(五)

从接点到融合： 治理相对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S市T区的经验观察

陈荣卓 刘海燕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试点探寻和系列探索, 展现了以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可行之法。但广大农村相对贫困地区面临的上下层级组织间张力不足、资源统筹和贯彻执行效力不足、个体驱动和参与建设动力不足等问题影响共同富裕进程。文本基于S市T区通过治贫致富的实践探索有效建构“政党组织—市场利益—社会合力”的三维结构, 打通“接点驱动—融合治理—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 形成“以治理助力减贫, 以治理驱动共富”的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经验, 呈现三条关键启示: 第一, 结构性的“组织接点”融合是共富为民的前提条件, 优化了市场经济环境; 第二, 要素性的“利益接点”融合是共富惠民的内在机理, 激活了灵活多样的项目建设; 第三, 功能性的“社会接点”融合是共富惠民的现实方向, 为产业创新和城市转型贡献了社会力量。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相对贫困; 融合治理; 接点驱动

中图分类号: F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4) 05-0046-12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回顾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落地基层的现实探寻, 其中, 破解和治理相对贫困迫在眉睫。基层之治是国家治理的微观投射, 也是破解相对贫困的“试练场”。中国式现代化让“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①成为治理相

对贫困的新课题, 为实现共同富裕贡献了治理经验, 特别是如何防止脱贫攻坚出现局部性倒退和规模性返贫、如何发挥治理经验成效并推动共同富裕在基层全面开花, 成为亟待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的贫困治理进程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公众参与”的主体变迁, 从“广义性、救济式”到“发展性、开发式”再到“精准性、全面性、参与式”^②的机制变化, 从聚焦

收稿日期: 2023-07-2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研究”(22ZDA06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机制研究”(21BKS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荣卓,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海燕,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徐勇:《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位与路向》,《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翟军亮、吴春梅:《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张玉:《在社会治理中实现精准扶贫》,《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

“保障生存”的救济式扶贫转向重视“体制变革”的开发式扶贫，进而转向“金融扶贫+精准扶贫”的综合性扶贫^①。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贫困线并非衡量地区发达与否的固定标尺，而是用于协助现实解决贫困问题的参考维度。相对贫困的破解离不开治理，当前，中国正处于相对贫困治理的攻坚克难期，必须更加聚焦相对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发展韧性及融合建设。中国的治贫经验为经济发展、要素激活和市场盘活提供了重要参考视角，基层治理为群众探索物质、精神、生态富裕等提供了可行方案。由此可知，相对贫困是贫困现状在地方的相对表现，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治理任务和致富需求。

国内学者分别从主客观视角探讨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及特征。从参照群体看，有学者认为，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不同成员间由于主观认定的可维持生存水准的差别而产生的贫困^②；还有学者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脆弱性、无发言权、社会排斥等社会层面的“相对剥夺感”^③。贫困不仅表现为由于生活水平低下产生的社会排斥，而且表现为以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为参照物感受相对剥夺的社会心态以及安全感和话语权的缺乏^④。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⑤，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指导性。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任务，具有“强烈的政治性”^⑥及“散点化、高流动性”^⑦。依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50%与60%分别设置低、中、高三条相对贫困线，实证表明“相对贫困线标准越高，贫困线的涨幅越大，农村始终

远高于城镇且绝大部分相对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村”^⑧。不难发现，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因此，无论衡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参考和指标，还是判定相对贫困地区的指标和结论，目前均无明确规定，仅有政策层面的引导和学术层面的探讨。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强调生产和分配的更好结合。“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人和物的要素在市场的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涉及制度、政策、政党力量等发展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实现“富裕”目标，要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提高经济效率，做大做强经济体量；对标“共同”目标，要坚持公平原则，强调分配合理。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共同富裕应“是高质量发展状态和过程的统一，是当前和长远、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统一”^⑨。从特殊意蕴层面看，共同富裕具有“非同步性、非同等性、非剥夺性、非享受性”^⑩。概言之，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统一。发展是前提，共享是核心，可持续是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⑪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表现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

① 曾小溪、汪三贵：《中国大规模减贫的经验：基于扶贫战略和政策的历史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王昉、王晓博：《新中国70年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路径与逻辑架构——基于政策文件的文本对比研究》，《经济学家》，2020年第2期。

② 林闽钢：《相对贫困的理论及政策聚焦——兼论建立我国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社会保障评论》，2020年第1期。

③ 郭熙保、罗知：《论贫困概念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④ 杨舸：《流动人口与城市相对贫困：现状、风险与政策》，《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年第1期。

⑤ 陈宗胜、黄云：《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21年第5期。

⑥ 陆汉文、杨永伟：《从脱贫攻坚到相对贫困治理：变化与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⑦ 叶兴庆、殷浩栋：《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中国减贫历程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改革》，2019年第12期。

⑧ 李莹、于学霆、李帆：《中国相对贫困标准界定与规模测算》，《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期。

⑨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

⑩ 张占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理论与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

⑪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这一目标指向为分析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

现有的相关研究提出四条破解相对贫困难题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路径。一是政党组织发力型,主张以历史观深度挖掘共同富裕思想中有力政党的统筹效力,并联系有为政府的制度优势、有效市场的生产活力和有益方法的科学思维,从组织力量方面着手优化战略定位,进而推进共同富裕。二是贫困监测突破型,从量化方法入手,主张设立相对贫困标准,采取科学化、指标化标准引领贫困地区实现经济突破,“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②进行追踪测评,以评促改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机制衔接激活型,立足现实构建衔接完备的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激活区域生产发展要素和社会保障要素,让“防范—阻断—衔接—开发”机制^③充分运转并充满活力,例如,“建构韧性就业机制”^④和具有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市场主导激励型机制”^⑤改变城乡及流动性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四是政策积极推动型,在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内生动力等维度构建面向共同富裕的治理相对贫困的积极型政策体系^⑥。此外,还有研究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减贫效应以及三次分配对相对贫困的直接及间接作用等重要板块^⑦,强调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治理贫困,推动共同富裕。

围绕相对贫困地区是否有可能、有方法实现共同富裕,治贫和共富之间有何关联,治理贫困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机制如何为共同富裕奠基和助力,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环节和要素才能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治理基层贫困问题的经验如何直接或间接驱动、助推直至实现共同富裕等

问题,现有研究大多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和必要环节,相对贫困治理方案可以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治理视角,发挥一定的奠基作用和助推作用。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让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和睦,释放了社会活力,有利于市场繁荣稳定和人的综合发展。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在治理相对贫困和共同富裕方面,通常过多强调“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将其简单等同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忽略了与“富裕”紧密相关的收入增长机制、项目驱动机制等有关收入和分配、效率与公平的探讨。在解决贫困方面,现阶段的主要做法多围绕挖掘政党组织力量,创新相对贫困监测手段、治贫长效机制和政策展开,鲜有研究从“外部驱动—内部融合”的治理视角探究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可行性,在机制运行和逻辑理路方面缺乏实证检验。事实上,无论何种形态的治理,都强调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需要社会力量倒逼、反向驱动经济市场的思考,特别是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能否以外部接点驱动内部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利用治理的反驱力实现共同富裕有待关注和深度探讨。

二、研究框架与案例概述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和必要前提。“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标志着相对贫困治理正式进入政策议程并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但历史性的贫富差距、概念性的相对贫困、路径依赖下的贫困治理,进一步增大了治贫难度。治理相对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主要目

-
-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 ② 王政武:《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③ 李晓园、钟伟:《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④ 左停、苏武铮:《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指向与政策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⑤ 翟坤周:《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振兴的东西部协作机制重构——基于四个典型县域协作治理模式的实践考察》,《求实》,2022年第5期。
 - ⑥ 王卓、徐杰:《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积极社会政策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 ⑦ 刘洪、张想想:《相对贫困:内涵特征、多维困境与研究展望》,《世界农业》,2022年第6期。

标，二者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需进一步探讨基层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要素和融合机制。

（一）研究框架

区域治理危机和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匀质性，需要执政者把握现代性建设中多重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笔者以S市T区为例进行考察研究。T区是经过2014年“撤镇设区”调整区划并统一布局后的“散装”城市区域，成立之初为应对脆弱的“统一—散治”系统布局，采取上下联通的方式，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组织接点和利益交点，以“创接点，促融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改变经济乏力疲软、市场狭小有限、农民收入短缺的状态，进而使T区得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有效衔接与协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续的乡村振兴试点以及基层治理改革试验中，正因有像BQ村、BL村、SJ村等诸多“微治理单元”，不断深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激励和领导驱动作用，才能有效建构“政党组织—市场利益—社会合力”的三维结构，打通“接点驱动—融合治理—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进而形成“以治理助力减贫，以治理驱动共富”的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经验。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性共同富裕，即缩小城乡差距；二是相对性共同富裕，即一个村庄成员的共同发展^①。相较而言，现阶段的相对贫困地区^②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消除差别。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广大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从相对贫困到富裕的过渡，也表明农民生活状况差距缩小，把握了共同富裕的统一。笔者依据T区设立前后经济社会发展样态的对比以及近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初步搭建以接点驱动融合治理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见图1），旨在进一步揭示“接点治理”下的组织载体、利益集体和社会整体间的协调、融合发展，以期更好地梳理通过基层有效治理驱动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运行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面向共同富裕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试点探寻和系列探索，展现了以治理驱动共富的可行之法。但广大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受上下层级组织间张力不足、资源统筹和贯彻执行效力不足、个体驱动和参与建设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共同富裕进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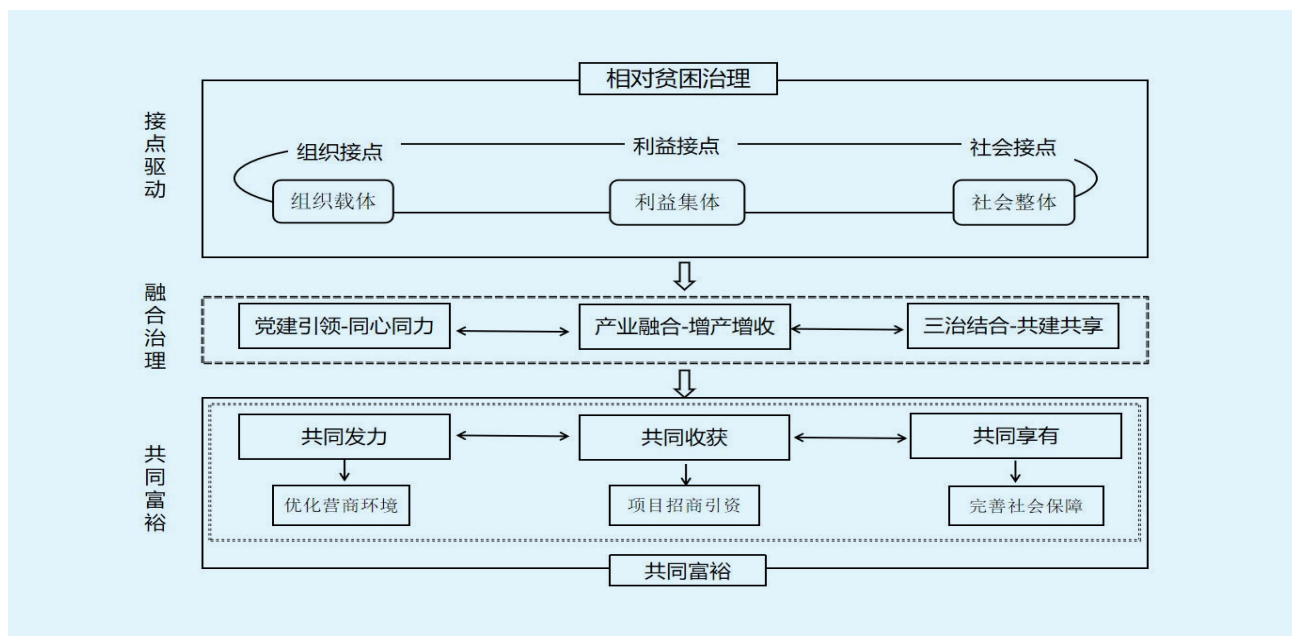


图1 “接点驱动—融合治理”下共同富裕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① 徐勇、朱城坤：《以共同缔造推动共同富裕——基于农村“共同缔造”实践的考察》，《行政论坛》，2023年第1期。
- ② 在既有研究中，相对贫困地区指因客观社会生活收入处于低水平状态（例如，物质生活方面实现基本温饱，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要版块仍处于相对劣势状态）及个体主观心理感知状态下因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让处于社会中的个体身心皆处于被剥夺、被排斥的“边缘状态”的地区。若放任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财富分配不合理，将激化社会矛盾。

是在这一意义上,治理相对贫困的功能性作用形成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例如,相对贫困治理政策演进中的就业机制如何稳定持续发展,治理语境下的多元主体力量如何灵活提升多维度的就业发展机会,乡村振兴战略激活的社会发展活力如何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裕?“富裕”是先决条件,“共同”是最终目的,一系列的追问需回归治理本身,进一步挖掘治理的功能作用和运行机理,深入思考共同富裕蕴含的治理智慧,特别是如何以治理力量驱动市场资源并融合市场要素。回顾相关研究,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分析维度。

一方面,以接点治理驱动市场经济。“接点”作为物理概念,一般指在开关、插销、电键及继电器中使用电路或通或断的开合点。自徐勇提出“接点政治”、以县域作为分析单元以来,学术界将接点治理延伸至贫困研究^①和精准扶贫^②等维度。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接点”是区域发展和资源融合的关键。“接点”作为衔接内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扮演了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角色。同时,“接点”为富裕提供了前提条件,权力接点、空间接点下的市场环境拓展了更多项目来源。“接点”强调国家层面的组织、人才、资源介入或挖掘现有“接点”的链接资源作用,核心是利用外接力量进而更好地培育内生动力,为经济富裕提供条件和前提。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制度活力。市场要素以“接点”形式进入基层,不仅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和配置效率影响市场资源禀赋,“一个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③。“接点”经济要素能够更好地培育市场经济发展土壤,成为传递惠企惠民政策的新渠道。

另一方面,以融合治理孕育社会资本。融合能够深化“价值融合、主体协同、聚合效能和制度优化”^④,中国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塑造了乡村治

理新体系,也让乡风民俗成为塑造农民精神富裕的重要动力。共同富裕离不开融合发展趋势下的社会资本力量。多方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融合”激活了市场活力,“融合”又为“共同”贡献了社会经验。例如,借助理治贫困中生成的经验,发挥治理的形塑作用,进而引入项目培育更多就业机会,激发市场发展内生动力,加大培训推动灵活性就业,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以及进一步消除农村社会性发展差距。“接点”是“融合”的前提,也是“融合”得以发展的关键点,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结合,不可分而治之,融合治理是“接点”的相融相生,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点状“治理接点”扩大、交合、联结并融合共治的过程^⑤。各种治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呈现“接点—融合”的关系走向。类似的还包括将议事协商机制作为接点,发挥“兜底”“牵线”^⑥作用,实现跨域环境治理的协同发展,或将“接点”引入农村基层精准扶贫,以“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⑦。

质言之,无论“接点治理”还是“融合治理”,或是逻辑机理和实践论证,都为探究治理作用于共同富裕的运行机理提供了已见的可能成效。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建设的增产增收和社会治理的提质增效,进而在融合效率和公平中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在“路径—目标”的运行下,搭建“接点驱动—融合治理—共同富裕”的逻辑假设,即剖析“接点”的驱动力和“融合”的协作力在市场、项目、要素等方面的功能性作用,进而指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机制运行和制度优势。

(二) 研究案例

T区前身分别是建于1986年的T镇、建于2001年的F镇以及建于2006年的Y镇,2014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撤销三镇设立S市T区。T区面积624.9平方千米,共有45个村,包括村委会19个,居委会26个,总人口32万余人。其中,

- ① 谢小芹:《“接点治理”: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
- ②⑦ 徐明强、许汉泽:《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③ 林毅夫、潘士远、刘明兴:《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
- ④ 姜晓萍、许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维度透视与融合路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⑤ 刘开君、王鹭:《融合型治理:城郊村秩序重构的接点互动、运转逻辑与模式转型——以浙江省G镇治理实践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 ⑥ 杨旭、陈廷栋:《协同速度与接点治污:论中国跨域环境治理的议事协调机构》,《当代经济管理》,2023年第10期。

户籍人口 21.52 万人，流动人口约 11 万人，是海南省唯一的黎、苗、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区。T 区正式设立后实施“区一村（社区）”两级政府便民服务体系，使基层长期存在的“一针串起千条线”的局面以及居民参与无力、组织统筹乏力、社会组织乏力的“断点”问题凸显，全区经济发展乏力。2018 年 12 月，民政部公布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T 区正式入选并成立建设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工作领导小组，选定 BQ 村、BL 村、SJ 村三个出自不同片区且各具特色的行政村作为典型样本（三村概况见表 1），通过 3 年的全力打造，实现了全面推进产业、组织、人才、文化、生态发展和服务创新。伴随乡村振兴试点以及基层治理改革试验，三个典型村通过争取机遇、主动探索和破解区域贫困治理难题，通过创设“接点”盘活辖区资源，在 8 年内实现了产业、市场、项目的繁荣发展，村民在物质、精神、文化层面得到全面发展。

“十四五”时期，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既有成果，而且要进一步梳理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着眼提升相对贫困地区的治理水平。2021 年，T 区脱贫攻坚任务圆满收官，当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281 元，同比增长 9.5%。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454 元，同比增长 9.2%；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82 元，同比增长 11.1%。如果将 2022 年度农村居民中位数收入（17734 元）划分为相对贫困线标准（60%）或参考欧盟标准拟定贫困线（40%—50%），该区的相对贫困标准为 10640.4 元、8867 元和 7093.6 元。从贫困划分标准看，T 区 45 个村（社区）在相对贫困标准线区域内，整体仍处于相对贫困地区。同时，T 区范围内社区数量多，农村分布不均，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问题长期存在，在全面脱贫攻坚后仍需在经济制度和社会资本方面继续同向发力。由此可见，深入剖析上述典型村案例中通过治理助力减贫和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做法，厘清其为 T 区解决相对贫困、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的发展动力、驱动要素，分析 T 区乡村振兴试点以及基层治理改革实验中体现的治理思维和共富机制，探究“接点驱动—融合治理”对于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参考经验及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设接点：以治理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治理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能和社会动能。“统合散治”的战略布局为 T 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必备土壤，也为基层探索共同富裕机制奠定了现实基础。例如，进一步激活主体、项目和人才以及在参与性的市场主体、竞争性的营商环境和持续性的生计能力方面多维发力（见图 2）。近年来，T 区通过采取“党组织+网格化+信息化+联合指挥中心”的城市网格管理治理模式，以“统”的理念进行系统布局、整合治理，以“合”的机制搭建综合服务平台，不断振兴经济建设，提高发展效率。笔者以案例形式探讨特定区域的特色化增产增收经验和共同富裕机制，试图阐释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验及内在机理，梳理通过基层相对贫困治理助力共同富裕的运行逻辑，旨在提供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分析视角。

（一）组织接点：党建引领激活参与性市场主体

共同富裕是全面覆盖和全体参与的统一，要始终坚持以发展为核心任务。在党建引领的组织统筹下，明确党建引领的工作主线，展现了统一布局和分散治理的组织接点。党建引领奠定共同富裕的组织基础，以组织合力的治理效能激活参与性主体，充分发挥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T 区设立前，基层党组织涣散、组织失衡现象时有发生。海坡片区、高峰片区地处偏远，城郊村、贫困村的常驻村（居）民的文化层次和思想

表 1 T 区三村基本情况表

序号	村名	所属区域	地理位置	断点	接点	融合
1	BQ 村	高峰片区	山村	农民参与无力	利益活力	项目驱动和美乡村
2	BL 村	羊栏片区	城中村	组织统筹乏力	政党动力	战略驱动特色乡村
3	SJ 村	海坡片区	城郊村	社会组织乏力	社会协力	社会驱动庭院经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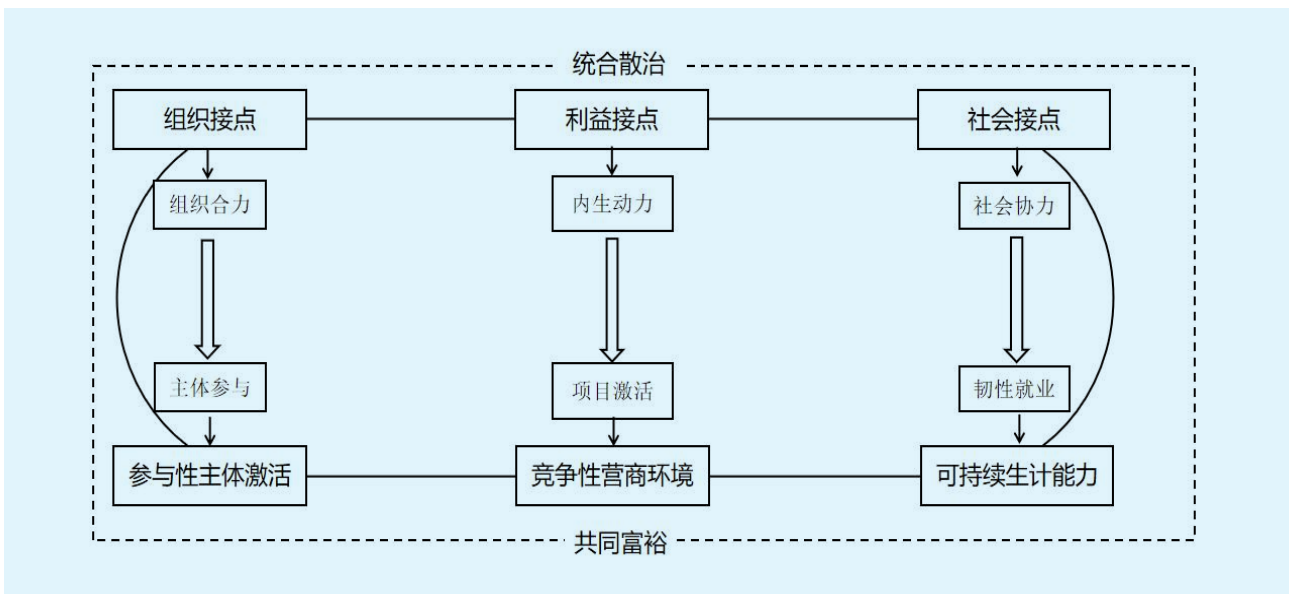


图2 治理力量推动共同富裕运行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觉悟普遍不高。为摆脱发展困境，T区以“融合治理”为党建方案，形成党组织引领下的组织合力，促进生产要素实现快速流动，让城乡资源配置形成组合优势，培育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打通致富新路径提供了组织接点。以“吹哨办理”加速共同富裕的组织间协作。为提高政务服务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破解组织“断点”，T区以网格化管理机制“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一网统管，巡办分离”的“吹哨办理”机制提高为民办实事“一张网”的政务服务水平，“党支部设在网格上”的网格化关联模式，将党支部作为组织力量的重要接点。同时，T区以开展“横纵联结”机制，横向联结机关、企业、两新组织等不同主体单元，纵向贯穿“市一区一村（社区）”的三级组织体系，推进区划战略安排，不断生成村、社区的独特自治方案。随后，居民收入来源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均衡发展过渡，乡村主体的参与活力大为增强。

（二）利益接点：项目谋划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

乡土社会是特色的利益共同体。利益作为组织行为的驱动来源，可以极大地促进地方发展。在基层实践中，文旅结合、农旅融合等项目是利益接点得以畅通的重要抓手，可以极大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和居民就业，形成“相对贫困治理—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①三方良性互动机制。T区撤镇前，项目短缺、就业单一且无支柱性产业，城乡差距大、辖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为求突破，T区以“项目”形成利益接点，或自主培育挖掘创新项目，或引入外来资本合作发展项目，开发旅游项目、农业项目、光伏发电项目，等等。广大农村地区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过程中不断推进增量改革，打造出一批乡村振兴试点。同时，T区借助试点创建契机，以利益接点带动良性互动，形成积聚效用。在衔接精准扶贫策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推动各村（社区）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发展路径，聚焦乡村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全域治理中的城乡资源统筹，不断以企业入驻、产业振兴、项目激活等形式吸纳新兴项目。

（三）社会接点：韧性就业培育可持续生计能力

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为群众队伍的扩大。”^②只有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目标一致时才能推动共同富裕，推进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共建。T区借助区位优势 and 惠企政策方针，关注韧性就业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以社

① 解安、王立伟：《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相对贫困治理对策研究》，《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会协力推进共同富裕，呈现社会接点下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多样化发展与居民可持续性提高生计发展能力的各类培育机制。T区以志愿活动培育社会资本力量，聚焦社会各方志愿组织形成的社会接点，以各类志愿活动推动基层融合发展，推出以共同富裕为底色的文明创建活动，创新积分制、清单制、网格化的综合管理。此外，T区积极培育各类社团组织和志愿组织，让文明创建、家风传承、民主评议等活动聚焦社会协同发力，让良好的社会风尚、互助友爱的志愿精神在特色活动中焕发生机，打造“辟旧创新”的社会融点。同时，T区有效利用国家推行建成的社会工作服务站，以社工组织培植新生志愿力量在承接公共服务方面开展专业性指导性工作，借助《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和运行实施方案》引进社会力量，开展文创志愿服务活动。T区以“管理一张网、治理一盘棋、服务一站式”理念，通过“手拉手”聚集治理合力，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基层治理格局，有效避免城市管治陷入集中或分散的困境。

四、走向融合：以治理集成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

接点治理为何能够推动基层治理格局从分割、断层走向融合、共同富裕？接点治理构建完成后，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治理工作高效、稳定运行？笔者从政党、市场、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厘清组

织合力、项目动力和社会协力作用于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见图3）。

（一）组织合力下的共富联盟机制

党的领导是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首要原则。共同富裕必须坚定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从基层治理的经验中把握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问题。党的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党组织“主导驱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推动”同向发力、互动互促，能够更好发挥组织统筹效能，应对城乡、区域、阶层间发展失衡问题。网格管理员是“支部建在网格中”的接点力量，快速响应、及时反馈、创新打造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网格化机制让矛盾化解在基层，社区开展的群体活动能够激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动力。T区采取“双网共治”和积分制管理的统筹方案，以“统合散治”推进组织创新。第一，在党组织融入乡村振兴各环节方面，BQ村以区域党建、政企合作、专业协会等构建专业化、组织化的保障机制，打通资源的堵塞点，充分发挥党建联盟驱动共同富裕的“红色引擎”作用。此外，BQ村依托村企结对平台，通过组织联动、资源联用、活动联办、利益联合，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第二，在挖掘党组织的资源整合功能和示范带头作用方面，SJ村利用多方力量拓展收入，打通社会资源，逐渐形成“政府+公司+集体+村委+农户”的五位一体模式，提供金融服务、生活关怀、社会救助等服务，宜业宜居的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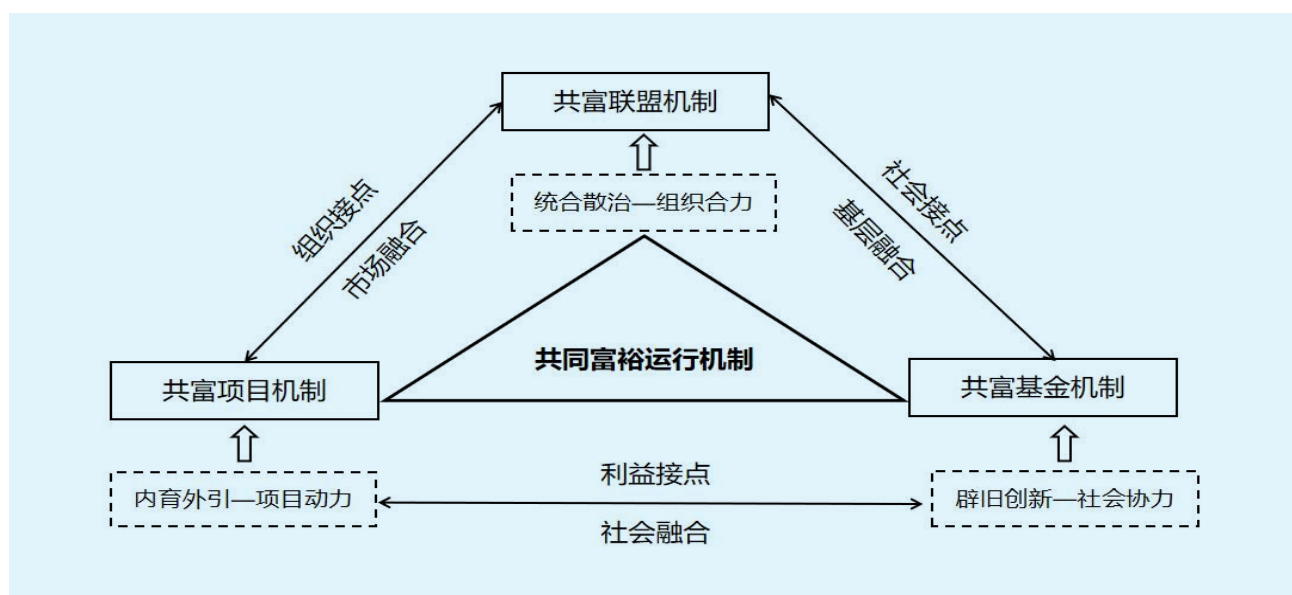


图3 共同富裕运行机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村治理格局逐渐成型。“党建+产业”形成新的村集体经济创收来源和村民经济增收渠道，其相应品牌建设也成为探索经济富裕的重要支点。庭院经济、多项目集群经济及农家乐等经济形态均是党组织引领创新开拓的结果。

（二）发展动力下的共富项目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要将个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内核，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合法、公正的公共性和分配、效益的适当性，把握项目带来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就发展动力下的共富项目机制而言，首先，在内育本土特色项目方面，融合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打造城郊融合服务型村庄；创新发展庭院经济，盘活闲置资源，探索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SJ村作为“空港服务村”，通过产业联合发展、特色共建、设施共享、活动策划、文化传承等方式，重点谋划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项目、特色民宿项目、共享农庄项目。同时，首创庭院经济协会，联合辖区内农村商业银行及林业科学院等推进党支部共建，联合林业科学院及农业科学院开创“村集体+科研院所+村民”的发展模式，进而联合共建打造村庄利益共同体。其次，在外引招商新兴项目方面，推进共同富裕必须以多种手段增加居民、村民就业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切实增加居民、村民利益。近年来，BL村以项目形式扩大吸纳范围，打造集乡风文明和民俗体验为一体的行动共同体。以农业为根基，就地吸纳农民创业就业；以产业为抓手，推动大型公司入驻；以旅游做加法，不断完善乡村休闲旅游服务体系，推动就业转型，增加经济创收。

（三）社会协力下的共富基金机制

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中，各主体力量构成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资金来源和经济要素。基于地缘、血缘、业缘关系，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渐暴露，相对贫困地区的制度僵化、技术滞后、人才短缺等

难题仍未解决，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之路。要形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必须充分挖掘社会力量，努力营造公平、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基本分配制度，强化就业优先政策。”^② T区三村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协力下的共富基金机制。首先，政府定向拨款，以专项资金加速推动和美乡村示范建设。相对贫困地区各项资源缺乏，前期需要依靠财政资金予以支撑。BQ村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凭借“三农”的重新规划、布局以及一批乡村振兴服务队入驻，以政府扶持为抓手，充分利用专项资金，以生态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打造真正美丽和谐的乡村风貌。其次，集体经济专项奖励，以助学奖学机制努力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建离不开共富基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T区各村（社区）高度关注青少年教育问题，以集体经济专项资金为升学困难的家庭提供帮助，并以阶梯制分梯度奖励高考考生。最后，社会志愿集资建设，以地方性慈善组织反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返乡创业的当地居民发放针对性补贴，以乡贤创新创业为契机，汇聚社会财富资源。

五、建构体系：以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复合逻辑

基层治理不仅为治理贫困培育了主体力量，而且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从具体实践看，全国各地开展的有关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使治理驱动共同富裕的逻辑体系不断具象化。从主体参与视角看，政府、市场、社会紧紧聚焦人民需求，在协调主体供需矛盾中形成重要连接点；从价值形塑视角看，共建共治共享思想在基层实践中不断融合，在压实责任边界线中指向共同富裕；从制度构建视角看，在激活资本力量中逐渐形成以联盟、项目、基金机制为支撑的共富服务综合体。聚焦人民需求，打通治理供需接点；压实责任边界，形成网格服务纵横网；汇聚区域内外资源，打造为民服务综合体。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31页。

② 孙万君、姚娟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及实践进路》，《理论导刊》，2022年第4期。

T区的实践不仅展现了农村相对贫困地区的强大发展动力，而且展现了汇点成线、以线带面、绘面成体的战略智慧以及通过治理驱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之法。

（一）党建引领的组织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领导是贯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进程、治理相对贫困现实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人才队伍以及自我革命机制，使党组织能够综合统筹治理基层问题、推进共同富裕战略布局，始终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不断打造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领导布局。以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以党的领导推动区域探索组织创新、项目创新和平台塑造，为政府、企业、社会互动中生成的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间的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即以多种形式推动居民实现物质充裕和精神富足。基层党组织链接资源、人才、阵地等治理接点，围绕人民群众需求，建立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中心。“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以党员带头、率先垂范，激活主体创新意识，推动美丽乡村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提升治理主体对中国治理实际的认识，将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且可将政党的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进而盘活地区全域资源，最终为实现村民增产增收，建设美好家园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二）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

共同富裕的起点在于全体人民参与共建，发展是第一主线，共同富裕的终点和重点在于社会成员实现共享，公平性与可持续性是最追求。中国的经验和政策试验证明，只有牢牢抓住人民需求，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才能真正贯彻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多层次地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和调整市场经济环境以适配现代化趋势。同时，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需要重视相对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引入常规化、针对性较强的培训活动和技能指导，增进村民知识素养、探究韧性就业机制，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通过上述举措，不仅可以提升村民的可持续性生计能力，避免陷入

“等、靠、要”“平均化”的致富误区，而且可以鼓励基层群众创新发展新兴社团组织和小微企业，推动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良性循环，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生态富民的行动逻辑

从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看，“多极化”“固化”“下迁”等现象引发“差别富裕”^①。同时，区域规划发展存在“强强联合”趋势，缺乏对“强弱结合”的关注。相对贫困地区探索共同富裕，要向先行示范区学习。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以示范样本推进创新发展，建设领导小组，积极落实统筹协调、整体部署、工作推进和监督考核等工作，为打造典型样本提供保障。治理相对贫困，不仅要预防规模性返贫风险，而且要防止共同富裕在国内出现两极分化。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绿色发展底线，是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共同富裕在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行动指南。一方面，尊重自然环境，做到合理开发，厘清产业发展方向，编制可实施的规划，调动发挥群众主观能动性，尤其在产业、人才、文化等具体领域，以项目为载体，发挥产业的“造血”功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构建项目驱动乡村振兴进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利益接点，进而激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重视试点先行，发挥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优势、生态优势，推进富民工程，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专注生态宜居、生态富民、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等方案的融合开发，打造一批有特色、有活力、可持续的生态示范区、治理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等等。

（四）数据赋能的技术逻辑

从技术发展路径看，数字化、技术化、信息化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共同富裕政策的推进和落地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发展，培育良性市场环境，积极推动智慧社区、智慧乡村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传统乡村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在“数商兴农”背景下，文化数字化、乡村数字化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空间，进而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顺应大数据发展趋势，开发市场技术产品和政务服务产品，可以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在完善基础设施、整治人居环境、营造文明乡风等方面的技术短板，推进

^① 钟海、苏航：《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时代意义、现实阻碍与实践进路》，《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

生态产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和电商平台的兴起,为就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以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数字素质,以数字网络推进乡村电子商务、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发挥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同时,培育创新型、技术型人才队伍,提升基层就业韧性,为实现共同富裕储备综合素质高、专业技术强的人力资本力量。

六、结论:以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中国共产党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共同富裕和基层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同向发力,共同富裕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得到呈现。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相对贫困的多维性、长期性、阶段性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较绝对贫困更加复杂^①。因此,更需对标断点难题,发挥接点优势,通过总结提炼相对贫困治理经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贡献力量。笔者对从接点驱动的外部力量到融合治理的内生力量展开探讨,根本目的在于明晰治理驱动共同富裕以及倒逼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何以可为?归根结底离不开治理贫困问题,即如何走特色的实践路径,运行可行的实施机制。

一是“新与旧”的关系衔接。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动摇,做好政策的衔接工作。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复杂性有赖于坚实的组织引领,并形成多主体的运行合力。当前,党建引领下的新兴组织创建,例如,庭院经济行业协会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共同发力,能够快速提升市场主体和组织成员的活跃度。值得注意的是,从精准扶贫针对贫困地区开展的“排他性的特惠型政策”转向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的“公共性的普惠型政策”,制度优势和政策施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加快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协调好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内与外”的动力探寻。实现共同富裕要探寻基层主体的行动逻辑,挖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既包含组织内生动力,又包含组织外接力

量。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四个原则。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瞬间富裕,而是在勤劳工作、努力创新的积淀下进行的自然递进和重要飞跃。这要求高度关注城乡市场的异同,以“内育外引”为手段,激活市场内外要素。基层治理和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要打破各种资源要素利用不充分和发展乏力带来的失衡格局。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要将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政府制度保障,增强村级组织统筹发展的能力,培育农民主体性^②。

三是“个体与集体”的融合塑造。社会信用体系是推进共同富裕持续稳定的重要基础。因互助活动、人际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协调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冲突。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的互信互助水平,有利于打造平等交流的信息平台。为此,政府要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发挥社会政策的兜底功能。同时,要鼓励塑造社会共同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以“三治”融合为依托推进乡村治理,在各种社会自组织活动的推进中,使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得到缓和。在共同活动空间中,参与者的互信程度得以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凝聚共识,积累社会资本。

概言之,作为相对贫困地区的T区的实践表明,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和实践路径离不开组织载体、利益动力和社会保障,也离不开发展主线、公平核心和生态保障。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要注重党建引领下的制度衔接,利益导向下的市场调节以及道德实践下的精神动力。组织范畴内的党建引领与组织统筹,指明了共同富裕的奋斗方向;利益导向下的市场激励与利益共建,提高了城乡充分就业、韧性就业水平;在社会层面中,基层各类志愿活动和文明实践联合,提升了社会道德能力,培育了互助互信的社会资本力量。因此,相对贫困地区趋向共同富裕,离不开组织联盟、共建项目和社会资本,不仅要呼唤产业的加速发展、服务同心圆的多方绘就以及协同创新发展格局的共同缔造,而且要以“共富”为奋斗目标、以“共治”为实施手段、以“共享”为时代价值,努力构建共富联盟的保障机制、共富项目的促进机制以及共富基

① 陈宗胜、黄云:《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21年第5期。

② 叶敬忠、胡琴:《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主要挑战与重点回应》,《农村经济》,2022年第2期。

金的激励机制，把握发展效率性、分配公平性和发展持续性的统一。“接点驱动—融合治理—共同富裕”的运行结构以及“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生态富民、数据赋能”的逻辑路径使治理成效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成为可能。必须指出的是，笔者针对“接点驱动—融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逻辑体系以及针对“接点”和“融合”的治理经验分析仍有不足，仅从驱动导向出发，探究组织接点、利

益接点和社会接点之于载体、个体和整体的融合作用，对共同富裕的相关机制仅以地区案例为切入点，对不同地区的接点可能出现的连接不畅、自治消解、平台失效等缺乏深入探讨。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治理现代化发展还需进一步深化供需连接点、压实责任纵横线、搭建参与立体面、塑造服务综合体。因此，相对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更多实践和智慧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补充。

From Joint-point Drive to Integrative Governance: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 District in S City

CHEN Rong-zhuo LIU Hai-y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CPC has led the people to carry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pilot projects to explore paths to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ng the feasibility of governance-driven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the relatively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fac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nsion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levels of organizations,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in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for individual driven and participatory construction, which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achieving prosperity in T district of S city, explores the eff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market interests-social synergy—structure, to establish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joint-points-driven, integrative govern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using good governance to help reduce poverty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relatively poor areas.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three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ly, the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 “organizational joint-poin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common prosperity, as it optimizes 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integration of essential “interest joint-points” is an inherent mechanism for common prosperity, as it activates flexible and diverse project construction; thirdly, the integration of functional “social joint-points” is a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s it contributes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elative Poverty; Integrative Governance; Joint-point Drive

[责任编辑: 王文秋]

[责任校对: 曹晶晶]